

彭平一 著

冲破思想的

——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牢笼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彭平一 著

冲破思想的牢笼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牢
笼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冲破思想的牢笼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彭平一 著

BBC 4/03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 彭平一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4

I. 冲... II. 彭... III. 思想史 - 中国 - 近代
IV.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578 号

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彭平一 著

责任编辑 刘苏华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32 开 9.625 印张 241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 册

ISBN7—81031—880—2/K·052

定价: 24.00 元

序

郭汉民

近年来，我们曾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在我襄助吴雁南、冯祖貽和苏中立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就先后评述了1840～1949年间的一系列社会思潮，诸如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思潮、重商思潮、反洋教思潮、变法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君主立宪思潮、地方自治思潮、中体西用思潮、国粹主义思潮、佛学复兴思潮、复古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实验主义思潮、教育救国思潮、科学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妇女解放思潮、国家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好人政府主义思潮、联省自治思潮、乡村建设思潮、平民教育思潮、非基督教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复兴思潮、新启蒙思潮、抗日救亡思潮、中间路线思潮以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与完备等等，但尚未列出专门篇章讨论贯穿于中国近代始终的启蒙思潮。所以，当彭平一同志将他的20余万字的书稿《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以下简称《启蒙思潮》）放在我的书桌上并征求序言的时候，我没有犹豫多久就愉快地答应了，因为我不仅可以先睹为快，而且可以纵向了解启蒙思潮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把中国带入近代以来，启蒙就与救亡一道成为先进中国人必须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处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在清王朝入主中原的时候，西方就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英国建立

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随后又经过工业革命洗礼，实现了社会的全面变革，并逐步将整个世界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之中，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而此时的清王朝仍然在封建主义的轨道上运行，仍然安于现状，闭关自守，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只能以“天朝上国”无所不有、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欺人。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虽然也有过自己的“康乾盛世”，但实际上早已落后于世界潮流，它一定会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决斗中死去。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见，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力，也就是所谓“救亡”；二是打破封闭，学习先进，追赶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为此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即所谓“启蒙”。

启蒙即启迪蒙昧，使人觉悟。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作为 17~18 世纪欧洲思想史上反对宗教蒙昧和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文化运动，其进步意义早为人们所公认。尽管那时的伟大思想家们没能超出自己时代给他们的限制，但他们毕竟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恩格斯：《反杜林论》）这种“思维着的悟性”，这种批判态度与怀疑精神，在 17 世纪的中国，即在明末清初也曾存在过，

这就是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启蒙思想在西方形成成为批判封建专制的“理性法庭”而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在中国则被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政策所窒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力的东渐，西学也开始在中国逐步广泛传播，这就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思考自己的出路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从培根、卢梭到马克思、列宁，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博爱、平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西方在数百年思想里程中所形成的累累成果，在短短的数十年间都传进了中国。诚如梁启超所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正是启蒙的基本内涵。

在近代中国，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出路始终是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又必须向压迫中国的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东西，有效的救亡当以有力的启蒙为前提，所以伴随着反帝爱国、救亡图存斗争的展开，学习西方文明、追赶世界潮流的思想启蒙也在逐步深入。在特定历史阶段中，思想启蒙的具体主张一般不是个别思想家孤独的呐喊，往往都是此呼彼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本书的重要特色，就是把启蒙当作一种社会思潮加以考察，系统地研究了这一思潮的发展轨迹。梁启超对“时代思潮”曾作过一番奇妙的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又处于文化昂进之时代，“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一涨一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息”（《清末学术概论》）。

本书认为近代启蒙思潮的全过程经历了萌芽、兴起、发展、

高涨和衰退五个阶段，具体说来，鸦片战后至甲午战前的将近半个世纪，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社会批判与社会改革思想，洋务运动中的科技图书翻译，首任公使郭嵩焘的异端思想以及早期维新派“君民共主”的呐喊，都为启蒙思潮的兴起作了准备，起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是为萌芽阶段。在以救亡图存和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戊戌维新运动前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宣传自由、平等、民权，批判君主专制、封建纲常及“冲决一切网罗”的呐喊，标志着近代启蒙思潮进入了兴起阶段。辛亥革命前后，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为近代启蒙思潮的高涨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朱执信等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激烈抨击以及他们依据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理论和分权原则设计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时期成为启蒙思潮的发展阶段。其间“改造国民性”命题的提出，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高涨阶段。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鲁迅等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改造国民性”和“唤起民众之最后觉悟”为宗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对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及其所依托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算，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推向了最高峰。此后，在国民革命、国共两党离合与长期争战的环境中，虽有过人权派的抗争和30年代中期昙花一现的新启蒙运动，但总的趋势已经表明启蒙思潮在经过“涨—涨—涨”的过程之后，已经进入佛说中的“灭”的阶段，本书将其定为“逐步衰退的阶段”，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终结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征诸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思想发展的轨迹，这种阶段划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文化

背景之下出现的。近代以来传到中国的西学又是多种多样的，而真正对启开中国人蒙昧起重要作用的则是民主与科学两件宝贝。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高涨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曾庄严宣告，要坚定不移地“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这德、赛两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该书认为，民主和科学是世界近代文明的重要表征，是西方资产阶级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民主和科学都是舶来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既没有民主思想，也没有近代科学思想。当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迫打开时，西方的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也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走进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即是以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为其主要内容的。民主和科学传入中国的初期，曾与传统思想剧烈冲撞，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逐步对它产生兴趣并不断地向国人介绍。尽管在这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中，人们对西方民主和科学产生过许多误解，也经历过不少痛苦，但人们的认识毕竟在不断深化。在民主思想方面，从对西方的议会制度产生兴趣和仰慕，到君主立宪主张的提出，再到民主共和国方案的设计，最后人们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和价值观。在科学方面，从“师夷长技”阶段对西方“坚船利炮”的羡慕，到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再到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最后人们认识到科学并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本书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置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主流位置，并将人们对

民主和科学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视为近代启蒙思潮不断发展的过程，是颇有见地的。这构成了《启蒙思潮》一书的又一特色。须要指出的是，尽管民主和科学都是在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条件下传入的舶来品，但它已经与中国文化中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精华相融合，逐步深入人心，成为了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继承和发扬启蒙思潮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近代是激烈变革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种社会思潮泉涌风发，异彩纷呈，此起彼伏，千姿百态，这在我们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中已有了充分的反映。各种社会思潮，除少数反动思潮外，大都是围绕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的历史主题而展开的，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进步社会思潮的始终。这种情况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实国情决定的，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志士仁人可以舍弃个人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人们深知没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什么事业都办不成，所谓个人的权力、自由云云，也都谈不上。如果脱离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实际，忽视我们的先辈为救亡图存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和启蒙思想的特殊地位，是不妥当的。在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关系，过分强调救亡而否定启蒙，或者过分强调启蒙而否定救亡都是有悖于历史实际，因而是不可取的。本书的第三个重要特色是将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二者互为表里，相辅而行。鸦片战争后，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当他们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仅限于军事技术而包括“政教”制度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从君民共主到民主共和，都成了他们探寻的救国手段之一。辛亥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宣传民主主义，其

根本出发点依然是爱国救亡，只是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国民的自由平等正是民族自由平等的前提条件。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对此认识更加深刻，“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他们高举民主（最初是人权）与科学两面旗帜，大张旗鼓地反对孔教，反对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文学，号召青年争取个性解放，宣称“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那些发起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更直截了当地把这一“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等同于“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看成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作者在认真考察“这种启蒙与救亡结合的现象”之后，正确地指出：“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也是近代启蒙思想与西方启蒙思想相比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形势下，启蒙往往不得不让位于救亡，从而使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反封建主义思想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彭平一同志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届本科毕业生，长期工作在教学任务重、科研条件差的地方教育学院，然而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科学研究，探索不止，笔耕不辍，《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一书就是他长期探索的结晶。他请我为之作序，我曾有过一些犹豫，因为自己学力有限，见识不足。但我喜欢同青年朋友打交道，也乐意为他们做点事情，从他们的口中和笔下，常常可以感受到青年人特有的才思，听到他们不断进步的足音，从而分享他们的幸福和快乐。这篇序言就是怀着愉悦的心情写成的，衷心祝贺这本书的出版，希望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社会思潮的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目 录

绪 论	启蒙, 中国近代思想的主题·····	(1)
第一章	“风气略开之后, 异学未兴之前” ——鸦片战争后近代启蒙思潮的萌芽·····	(9)
一	“但开风气不为师” ——道咸经世派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 ·····	(10)
二	“发千古未有之奇秘” ——洋务运动中的科学启蒙 ·····	(23)
三	“独醒者”的孤独 ——洋务运动中的异端思想 ·····	(32)
四	启蒙思想的“前驱先路” ——早期维新思想的启蒙意义 ·····	(44)
第二章	冲决封建主义网罗 ——戊戌维新期间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 ·····	(63)
一	“冲决俗学之网罗” ——维新派反旧学、倡西学的文化思想 ·····	(64)
二	“冲决君主之网罗” ——维新派反专制、倡民权的政治思想 ·····	(78)
三	“冲决伦常之网罗” ——维新派反封建纲常、倡人性解放的伦理思想	

.....	(90)
四 “冲决群学、群教之网罗” ——维新运动中的哲学启蒙.....	(110)
第三章 “唤醒国民之精神” ——辛亥革命前后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	(124)
一 “脱数千年来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	(125)
二 “破宗教之迂说，除愚昧之习见” ——辛亥革命期间无神论和近代科学思想的传播	(137)
三 “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 ——辛亥革命期间民主思潮的广泛传播.....	(145)
四 “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 ——辛亥革命期间的国民性改造思潮.....	(156)
五 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启蒙的总结 ——从章太炎到孙中山的哲学启蒙.....	(171)
第四章 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新文化运动中启蒙思潮的高涨.....	(187)
一 “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	(187)
二 “以科学说明真理” ——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科学的思想.....	(196)
三 “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运动中对孔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	(207)
四 “最后之觉悟” ——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思潮.....	(218)

五	“新旧思潮之激战” ——新文化运动中的东西文化论战·····	(226)
第五章	革命大潮中的启蒙 ——五四运动后启蒙思潮的历史走向·····	(243)
一	过时的思想武器和固守的思想阵地 ——五四运动后启蒙思潮的低落·····	(244)
二	人权的呼声和文化的论战 ——20年代末30年代初启蒙思潮的复苏·····	(255)
三	救亡和启蒙的两重“变奏” ——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	(265)
四	近代启蒙思潮的“绝唱” ——40年代后期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276)
结 语	继承启蒙 超越启蒙·····	(285)
参考书目	·····	(291)
后记	·····	(293)

绪论 启蒙，中国近代思想的主题

在西方思想史上，“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主要指的是17~19世纪初在欧洲各地先后兴起的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潮。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莱辛，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在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即将过去的时候，对教会代表的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国家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大力宣扬理性和科学。“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他们认为，宗教神权主义是社会不能进步、人民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树立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他们把人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唯一尺度，认为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因此，宗教神学及其道德都应该统统打倒。他们主张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认为以经验为检验真理的科学能够使人类正确认识自然，增长知识，破除迷信，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与此同时，他们还强烈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自由思想，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造成社会不平等和文化经济的落后。他们大力宣扬民主和法制，强调“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以法律规范人的行为来结束使人们陷入不幸的专制统治的局面。这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为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几乎与西欧启蒙思想的产生同时。在17世纪的明末清初，封建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堤坝上打开了缺口，人民的反抗斗争正撼摇着封建统治的大厦。这表明，中国封建社会虽未达到全面崩溃的地步，但矛盾已充分暴露，已经出现了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特定条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以李贽、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那样具有“无可置疑神圣性”的教会势力，因此，与西欧启蒙思潮把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宗教神学蒙昧主义和经院哲学不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是以批判宋明理学所极力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为其重要使命。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与西欧启蒙思潮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怀疑、批判、“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精神。早期启蒙思想家首先对宋明理学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表示怀疑，主张“非名教所能羁络”，进而对宋明理学的“以理杀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们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天下之大害者”，^①并公然表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

^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非未必非”。^①

针对宋明道学的天人合一、存理灭欲的唯心主义伦理观，早期启蒙思想家主张重视人的价值和“人欲”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是天地间“至尊至贵”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而不是自然界的奴仆，自然界的一切“妙用”只有通过人才能显示出来。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人的欲望是天经地义的，肯定“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②反对道学家的禁欲主义，主张尊重人们的合理欲望。

在历史观方面，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的“五德终始说”、“三统循环论”、“道统相继论”、“复古论”等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对若干历史现象给予了平实、合乎事实的解说，从而形成了一些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历史观。如王夫之提出了“天、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他认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③在他看来，顺应历史趋势（势）正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理），人类历史就是一个理、势统一的自然过程。这一历史观表现了追溯历史发展真实动因的趋向。

有些早期启蒙思想家还以其特有的敏感，对明末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对明末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戴震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总结都反映了这种对自然科学的关注。这种关注丰富了他们的自然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他们还痛斥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虚浮学风，主张“经世致用”，提倡面向实际、注重实证的求实学风。

然而，中国 17 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远远没有西方启蒙思想

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②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③ 王夫之：《宋论》卷七。